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A Study of Grammatical Variation
in Singapore Mandarin

祝晓宏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得到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58)

国家语委项目 (WT125-2)

广东省高校优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2012WYM_0019)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 华文教育研究院

的资助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A Study of Grammatical Variation
in Singapore Mandarin

祝晓宏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 祝晓宏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 2015.11

ISBN 978-7-5192-0440-2

I. ①新… II. ①祝… III.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新加坡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69799 号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著 者: 祝晓宏
责任编辑: 夏 丹 张晓梅
装帧设计: 蔡 彬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8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92-0440-2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简 介

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语在海外的变体,本书以新加坡华语语法为研究对象。以往学者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研究偏重于寻找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是一种“基于特征(feature based)”的研究路径。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换一种思路,将语法特点或语法特征皆视为新加坡华语的语法变异;以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研究语法变项的使用。在比较各家对现代汉语语法变异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语体这一概念引入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以书面文献、大型华语语料库和问卷调查为材料,系统地比较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语法的使用差异。

本书从普通话与新加坡华语双向比较的角度,在六个方面:①词法变异;②实词变异;③虚词变异;④动词谓语句变异;⑤句法格式变异;⑥篇章变异,系统地描写了新加坡华语语法的变异。

本书得出的结论:①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在语法的各级层面都有差异,变异是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领域、不同使用者使用华语结果的叠加;②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语法的差异主要是变项的语体分布范围不同,使用频率不同;③按变项的语体跨度和使用情况把变项分为典型变项和非典型变项。论文从6个典型变项着眼,推导出新加坡华语比普通话更“文”,而普通话比新加坡华语更“话”;④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的趋同有3种类型:让位于新加坡华语的标准语形式,被普通话取代以及各种变异形式共存。

最后,全书把新加坡华语的语法变异总结为一个从“使用变异”逐渐向“习得变异”转变的模式,分化与趋同受到语言环境与语言内部因素的共同支配。

INTRODUCTION

Singapore Mandarin is a typical variety of Modern Chinese overseas, this book selects it as our investigation object. Previous studies on Singapore Mandarin focused on chasing features of it which can be generalized as a feature-based approach. On the guide of variation sociolinguistics, this book considers all the features discovered or to be discovered as grammatical variation in Singapore Mandarin and studies its variables and usages. After making a review of recent grammatical variation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we import style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and on the base of related corpus, written materials and socio-questionnaires to make systema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grammar of Singapore Mandarin and Chinese Mandarin.

The book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morphological variation; (2)full words variation; (3)empty words variation; (4)verbal predicate sentence variation; (5)sentence type variation; (6)text vari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idirectional comparison of Chinese Mandarin and Singapore, to describe variation in Singapore Mandarin.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grammatical variations are distributed at every corner of grammar system, the variation are caused by different people who use Singapore Mandarin in different spaces, different time and different domains; (2)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ngapore mandarin and Chinese Mandarin are represented in style span and use frequency; (3)variab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ypical ones and atypical ones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 spans and uses. From view of six typical variables, we can see Singapore Mandarin has more written forms than those in Chinese Mandarin and vice versa; (4) variables have three convergence types towards standard which is expressed of abdication, substitution and co-existence in Singapore mandarin.

This book at last design a variation pattern characterized as from exertion-inducing variation to acquisition-inducing variation, and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will be governed by language environments and language internal system.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3
第二节 语法变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7
第三节 语法变异研究的概念与假设.....	13
第四节 研究语料的选取与研究步骤.....	16
第二章 词法变异	20
第一节 重叠.....	20
第二节 附加.....	35
第三节 复合.....	44
第四节 小结.....	49
第三章 实词变异	51
第一节 名词.....	51
第二节 数词.....	60
第三节 量词.....	61
第四节 代词.....	69
第五节 动词.....	75
第六节 形容词.....	83

第七节 小结	86
第四章 虚词变异	88
第一节 副词	88
第二节 介词	100
第三节 连词	103
第四节 助词	106
第五节 语气词	114
第六节 小结	116
第五章 动词谓语句变异	120
第一节 “有+VP”的使用	120
第二节 “VP+中”的使用	126
第三节 “V+过”的使用	129
第四节 “V+回”的使用	131
第五节 “V+到+C”的使用	137
第六节 语序的差异	142
第七节 小结	147
第六章 句法格式变异	150
第一节 判断句	150
第二节 疑问句	155
第三节 差比句	158
第四节 双宾句	162
第五节 “把”字句	163
第六节 “被”字句及其他句式	166
第七节 小结	173

第七章 篇章变异	176
第一节 关联词的使用差异	176
第二节 照应成分的使用差异	186
第三节 评价成分的使用差异	190
第四节 小结	197
第八章 结 语	19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99
第二节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202
参考文献	206
图表索引	217
附录1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语料来源	218
附录2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 调查问卷	222
一、问卷(一)	222
二、问卷(二)	224
后 记	228

第一章 绪 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晏子春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①，在中国的土地上，大约10亿说汉语（包括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和方言）的人。其通用性、悠久性加上数量上的优势，使中国人所使用的汉语代表了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构成了现代汉语的主体。因此，对中国的汉语结构和变化的研究构成了现代汉语研究的主流。然而，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上，同样可以看到汉语也分布在世界其他地区^②，这些地区至少有数千万的华人正在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应该承认，现代汉语的大家庭不仅包括现代汉语的主体——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方言及各种社会变体，还包括现代汉语的域外变体——海外华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以及华语共同语。因此，若要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现代汉语，就不能不考察这部分人所使用的汉语。

汉语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上，汉语很早就走出国门，传向世界。根据李宇明（2007）的梳理，“汉语至少从先秦就不停向四方蔓延……起码在汉代已经传播到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西亚和欧洲。”汉语的生命力借着汉语的传播似乎愈加旺盛。资料显示，迄今为止，汉语分布在海外的国家多达165个^③。而最近十多年全球范围内上演的一波波“汉语热”，更是把汉语

① 参见其中的图A1及李荣撰写的说明稿《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又载《方言》1989年第3期，第161-167页。

② 参见李荣等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中的图B16a、B16b。

③ 参见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1页）中的数据。

的种子带向全世界各个地方。3,000万海外华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海外汉语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范畴内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只关心本土汉语,而不太关注海外汉语。汉语学界一般只研究境内的汉语及其变异,而不太涉及汉语在境外的变异。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强和学术领地的深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境外的方言变异(李如龙,2000;陈晓锦,2009、2010),但是对于汉语标准语的域外变异研究还是很少。境外学者虽然也做过一些汉语变异研究,但是因为很少得到主流汉语学者的呼应,仿佛成了一种“自说自话”,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国际性的汉语热潮以及海内外中国语言研究的互动,促使人们以一种更宽广、更宽容的视野来看待汉语。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加坡,会看到在这块不到700平方千米的岛国上,同样分布着数百万使用华语共同语和方言的人^①。近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在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不间断地传承中华文化、维系华人身份、开展华文教育和营造华语环境,发展了颇有影响的新加坡华语。无论人们承认与否,新加坡华语就像新加坡经济一样,已成为大中华区一道独特的城市语言景观。尽管多民族、多语种、多方言的环境使得新加坡华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语言的各级层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现代汉语标准语。但是这些特点及新加坡华语结构本身基本上都是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德熙(1988:128)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的“汉语”词条这样写道:“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朱先生对汉语的认识很全面。他的话也表明,新加坡华语不仅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变体,也是汉语域外变体研究的一个绝佳样本。

新加坡华语作为研究的绝佳样本是和它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1959年,新加坡获得英国核准的自治权,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独立共和国,并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教育体系和语言政策。华语与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共同构筑为国家四大官方语言,发展成为学校的教育语言和华人社会共同语。1979年的“说华语运动”之后,新加坡华语的标准度和通用度大大提高,人们对华语研究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新加坡华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共同语有其

^① 实际面积699平方千米,常住人口424万,华人265.7万,占76.2%,新加坡是海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参见郭熙主编《华文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30页)中的数据。又,根据世界人口网的数据,截至2014年6月,新加坡人口总数为574万,华人占74.2%。

独立的研究意义；不过，它又是从现代汉语发展而来的，这样的历史渊源，决定了我们在认识、研究它时，不能不考虑它与现代汉语的联系。

新加坡华语与作为大本营的现代汉语的分化大概始于上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两种变体的差异随着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隔离而越来越大（Chen, 1999: 97）。分化在历史层面上表现为，陆续形成了许多本土的语法特色，堆积在现在的共时平面上表现为语法差异，形成正在变化中的新加坡华语。在我们正要描写这些语法变异时，现代汉语的大本营普通话本身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语法变异，敏锐的语言学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了现代汉语内部发生的变异情况（刁晏斌，2003；邵敬敏，2008等）。而我们今天所要论述的，却是以往很少人关注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占75%以上的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华语及其语法变项、使用 and 变化。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基于“语法特征”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回顾

从社会语言学来看，语言的变异无时不在，无处不在^①。这句话虽然过于绝对，但是却道出了一个事实：语言会在时、空两条轴线上发生变异。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1980：266-277）曾说：“时间上的变异也许不是人们一下子所能观察到的，对于空间上的变异人们总是可以一目了然。……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索绪尔的这番话是就地理语言学而言的，而空间上的变异当然不仅限于一国之内，所以这番话同样适应于现代汉语的域外变体——新加坡华语的情况。

对于植根岛国的新加坡华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它和中国地理相隔遥远，和现代汉语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差异既有语音、词汇方面的，也有语法和语用方面的。而以往的新加坡华语各平面差异的研究，为我们认识新加坡华语，进行新加坡华语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在词汇层面，一些介绍新加坡华语词语特点的文章时有所见。对于有特色的华语词，汪惠迪（1999）编纂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商务印书

^① 2000年，第二届“语言变异与变化”会议的主题为VIEW（Variation Is Every Where）“变异无处不在”。参见Keith Brown & Vivien Law《访谈社会语言学家》（2002）“特鲁吉尔”一章。

馆组织各华语区学者编写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中也收录了千余条新加坡华语词。词汇的特色还经常引发关于华语规范的争论,成为海内外学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张从兴,2002;汪惠迪、郭熙,2002)。可以说,词汇差异显著,引人注目,相关研究成果在本体研究中最为丰富。词汇差异的广泛存在,促使人们比较理性地看待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趋同存异、双向互动”(郭熙,2005;李临定,2002;林万菁,2006)或者“尊重大同、维持小异”(王慧容,2003;徐杰,2005)等。应该承认,这些规范化成果的取得乃至语言观念的更新,都与词汇领域的研究相辅相成。其次,音系层面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学者们发现新加坡华语存在第五声(陈重瑜,1983)、无轻声、儿化(陈重瑜,1984)、声调有所偏离(卢绍昌,1986)、句子里没有轻重音(陈重瑜,1993)等特征。通过语音上的系统比较,新加坡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语音教学和推广标准华语。目前新加坡华语之所以能成为华语区中相当标准的一支,正是由于有语音上的根据。当然,语音、词汇领域研究的成果也与人们的认识有关,学者普遍认为词汇、语音的差异影响交际,所以比较关注这两个方面。

相对而言,语法层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在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中^①,以陈重瑜(1986)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吴英成(1987)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周小兵(1988)的《新加坡华语小说的语法特点》、萧国政(1999)的《新加坡华语虚词使用说异》、陆俭明(2002、2003)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邢福义(2005)的《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为代表。纵观他们的研究,以19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 隔绝期。1990年之前,新加坡与中国无直接的接触,主要是新加坡学者开展的语法研究。在这方面他们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现实的需要。研究特点是从口语语料出发,结合华语教学来描写语法特征^②,研究能密切联系本地华语的环境,如陈重瑜(1983)、吴英成(1987)的研究。

(2) 交流期。1990年新中建交后,中国学者有机会与新加坡学者合作,直接感受新加坡华语并参与华语研究。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学者多针对华语书面语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偏重于寻找语法特征,并就此来探讨规范问题,如林杏光(1992)、邢福义(2002)的研究。

可以看到,这些研究的倾向多从教学和规范出发,直接服务华语应用。由于

① 这里只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成果和特点作大致的介绍,详细的研究综述请见祝晓宏:《海外华语语法研究:现状、问题与前瞻》,《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

② 陈重瑜(1993)在“前言”指出,《新加坡华语——语法与词汇特征》就是“为了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课程而做的”。

是面向应用,也发现了不少语法特点。但是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在“系统、细致和全面”上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不够系统表现在,对语法特点的研究比较分散,集中在一些虚词和实词方面,词法和句法研究偏少,篇章研究更是非常少见,让人难以把握新加坡华语语法系统的面貌。不够细致表现在,一些隐性而重要的语法差异还没有发掘出来,对已发现的语法特征解释不足,很少作使用情况的说明,比如哪些是重复发生的语法差异,哪些是新加坡华语的合法特征,哪些只是本地人使用的偶然语误等,交代得不够清楚。不够全面表现在,孤立地看待新加坡华语语法,没有把它置于整个华语区的背景下,特别是与普通话的互动关系上来进行动态的辨别。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处于隔绝状态下的新加坡华语正在和普通话产生交流、渗透和碰撞。一方面,普通话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力正在加大,如周清海(2006)提到,在新加坡青年群体中,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特”开始流行。就新加坡华语自身来看,由于“讲华语运动”年年开展,原来华语中一些方言语法表达式也在逐渐消失,如“关灯一下、你走先、打给它死”,基本上已经很少在用。另一方面,新加坡华语也在间接地影响普通话,华语原来一些语法特点现在逐渐传入普通话。陆俭明(2002)预测会引入普通话的“有+VP”和“A+不+AB”,还有“不及物动词带宾”(如“登陆上海、把脉婚姻”)等格式,它们在现代汉语里已经非常流行(贺国伟,2003;王玲,2005;王森、王毅、姜丽,2006)。从双向比较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语法特点不再是孤立存在于一种变体之外。

这样看来,过去研究的共同倾向是从普通话的立场来单向地看待新加坡华语语法,一般只注意到了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不同、分化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相互影响、趋同的一面。所以,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描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特征(feature based)的研究思路^①。这种研究思路与当初隔绝状态下的华语环境是分不开的,有其历史原因。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已不能准确地反映新加坡华语自身的变异以及当下各区域华语频繁接触的现实。

2 转向语法变异的研究

其实,特点是相对、暂时的,变异、差异才是绝对的,永恒的。在全球华语

^① 在“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研究的早期阶段,也有这样的特点。Kingsley Bolton (2004: 367-396)把当时的“世界英语研究”总结为4种思路:“语言社会学、基于特征法、Kachru模型、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研究”。一些学者,如英国社会语言学家Cheshire, J. (1991: 1-17)曾对这种“基于特征”的单一思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变异的视角下,区域性变体的语法特点势必越来越少。周清海(2007)认为,在21世纪大都会融合的情况下,客观上也不提倡过分强调新加坡华语的特点。新加坡华语既在与其他华语交融,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新的局面下,有必要稍稍转换华语语法研究的视角,即,不仅需要描写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也需要动态地考察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以往虽然也有个别研究以变异的形式或标签出现,但大致还是对语法变异结果的确认,或者是就新加坡华语的整体探讨语法特点和来源,如周清海(2002、2007);针对语法变异的分布及其给语言系统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也鲜有论及。

与语法特点相比,作为一个更富理论性色彩的概念,语法变异或许是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认真研究新加坡华语自1979年“说华语运动”以来所经历的变化,我们认为,在趋同的形势下,对新加坡华语的语法差异、变项的使用和变化进行研究,将比以往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理由在于:

(1)在共时平面上,新加坡华语是从现代汉语演变而来的一个独立的语言变体。这个语言变体并不是一些语法特点的汇集,而是一个充满变异与变化的系统。用欧洲社会语言学家们的话来说:“当一种语言裂变为两种方言变体后,两个变体分化和趋同的过程中只是变异在作用,而不是绝对的方言特征。”

(Hinskens Frans, Peter Auer & Paul Kerswill, 2005: 7)既然新加坡华语是与普通话平行且是正在向后者靠拢的一个变体,全面、系统地比较其和普通话的差异既是可能的,也是迫切的。过去我们说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大同小异”,现在看来,“小异”也将难以为继。适时记录语法差异对认识新加坡华语以及观察分化的终点都将是难得的契机。

(2)在历时平面上,语法变异有助于把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引向更有解释力和前瞻性的层面。语法变异涉及变异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评价。过去的新加坡华语研究,在语法特点的描写和考源上已卓有成效,而对语法变项的使用、变化、扩散和传播关注得不够。语言变异是连接共时与历时的桥梁(徐大明, 2006)。现在,人们还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看到历史上的华语语法变化,而且语言交际的压力也要保证语法的变化不要过大。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正在进行的语法变异来预测变化的方向。从变异的视角出发,更有助于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新加坡华语。

(3)域内汉语、海外华语相对隔离的现象反映了汉语跨疆域变异的事实。社会语言学家Kachru(1990)曾按照使用层次把世界英语划为内圈、中圈和外圈(颜治强, 2002)。在Kachru的基础上,吴英成(2003)依据习得类型和使用域,把全球华语分为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圈和外圈。普通话处于全球华语的内

圈,新加坡华语处于中圈。不过,作为中圈的新加坡华语言社区结构并不是同质、单一的,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把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来学习,华语的使用域也越来越萎缩,华语向核心圈的趋同也越来越明显。因此,从分化走向同化的新加坡华语,所经历的语法变异和变化也最为激烈,可谓汉语变异的前沿。所以,对新加坡华语变异的观察,将能够最大限度地观察现代汉语的变异。

除了上述较为深刻的学术背景外,陆俭明先生近年来也倡导动态地关注新加坡华语语法。自从1996年发表《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一文,陆先生在句法方面发表了一些后续研究成果(陆俭明,2002、2003、2005)。2006年12月,在“首届华语调查研讨会”上,他提出新加坡华语语法很值得做深入的动态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语法变异研究也是对其提倡的积极响应。

第二节 语法变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提出从变异的视角来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这样研究角度就从以往的语法特点转向了语法变异。“变异转向”(variation turn)的考虑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众多关于新加坡华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有关华语教学(周清海,1998;郭熙,2004)、“说华语运动”(卢绍昌,1998)、华语使用和态度(陈松岑等,1999;萧国政、徐大明,2000;Xu,2005)以及通论性、政策性(吴元华,1978;云惟利,1996;吴元华,2009)的宏观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还将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是否有必要稍稍把研究的视角从宏观的层次转到微观的层次,就华语及华语变化本身进行研究?

其次,自从斯大林(1950)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提出语言演变的不平衡性,语法稳固甚至不变的观点深入人心。这种观念是对成熟的、单语的言语社区的总结,对于缺乏传统的新的接触性言语社区来说,情况则大为不同(Winford,2003)。新加坡华语既是多语社区中的变体,又处于完全城市化的言语社区之中,变异和接触现象在语法层面的表现要远远多于传统的汉语社区。从变异的视角观察、研究城市化和语言接触对语法系统的改变,将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单纯的普通话社区的语法变异研究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既有理论方法方面的原因,又跟普通话语法变异本身的细微性不无关系。新加坡华语是语法变异的温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新加坡华语的语法变异将能最大限度地带动汉语语法变异研究。

最后,从渊源上讲,新加坡华语是普通话的姊妹或兄弟,两者不是隶属或涵

盖关系。普通话正在发生变异，但是语法层面的变异还不多见，或者说它的显明性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各种新生的语法现象也在挑战人们的规范观念。普通话正在和其他华语产生互动，传统的建立在孤立的普通话立场上的规范观念也在受到冲击（郭熙，2006、2009）。对历史上的中国语言规划工作的审视表明，华语视角下的规划将会更加科学。研究新加坡华语的语法变异，对于反观普通话语法变异以及开展华语视角下的规范化研究，应该也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

语法变异在过去主要是社会语言学关心的话题，形式语言学不考虑或者说不重视语法变异。在乔姆斯基看来，变异是偶然的現象，是个别人的语言表现所致，不对语法系统构成影响；生成语言学应该只研究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产生的语料，变异不符合研究对象同质性的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语法层面的变异研究渐渐引起形式语言学在内的各语言学流派的注意。目前，对语法变异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原则与参数理论和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这两种理论也是当代语言学形式和功能两大流派的核心思想。有关它们的背景、异同以及在欧洲语言语法变异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参见Cornips & Corrigan（2005：96-134）的总结。在此，主要结合汉语的有关研究来谈谈它们的理论要旨和运用情况。

1 原则与参数理论

长期以来，语法变异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并不受重视。这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方言区人民沟通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政府首先需要语言学家开展推广普通话、推行简化字的研究。而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正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前者强调“语法具有绝对稳固性”，后者坚持“语法具有绝对的一致性”。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方言调查一般只调查语音和词汇特点，语法的分歧多被悬诸一旁，包括最先比较语法差异的赵元任（1980：8）也说“在文法方面，中国各地方言在文法上最有统一性”。

真正的汉语语法变异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朱德熙先生（1987）首次提出现代汉语语法的多样性，指出普通话和方言语法之间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北京方言语法为基础的多方言语法体系。不过，现代汉语究竟是一个共同语法，还是多维语法，语言学家们观点并不一致。

为此，陈平（Chen，1992）提出运用一个量级参数路径（Scalar Parametric Approach）来研究方言的语法变异，研究思路简述如下：

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定指成分是不能出现在复合趋向补语之后的。
例如：